



窮理致知

# 蔣渭水與台灣新文學

：社會運動下蔣渭水的文學風采\*

● 林柏維\*

## 一、阮是開拓者

歷史回到一九二〇年代，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體的文化運動，激發出台灣社會的動能，表現出來的是：反殖民的民族獨立抗爭、現代政治團體的組構、農工商學之社會運動的勃興、現代文學與藝術的推展，而核心價值則在台灣主體意識的覺醒。

隨著文化協會為主力的啟蒙運動、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，社會主義、民族自決主義等世界新思潮隨同引進，衝擊著台灣當時的思想界、文學界，海峽對岸的五四運動也直接、間接影響到留學中國、日本的台灣青年，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就在這樣的歷史場域中萌芽。

在文化協會因分途發展乃至衰退後，文化運動並未因而止歇，在一九三〇年代有著傲人的發展，台灣新文學在這時期反而更加滋長、繁盛；從《台灣青年》、《台灣》的播灑種子，到《台灣民報》成為文學園圃，從語文的改革到新舊文學的論爭，跨越到三〇年代的《南音》、《福爾摩沙》、《先發部隊》、《台灣文藝》，從新文學理論的建構到本土文學的深耕，台灣文化協會所從事的社會運動無疑地啟動了新文學運動廣泛的

\* 本文係 2011.3.26.應邀於義美食品公司主辦之「建國一百年閱讀蔣渭水」巡迴展首場活動的演講稿。

\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發展，甚至成為新文化運動和民族運動的生力軍。<sup>1</sup>

## 二、蔣渭水的時代：台灣文化協會的年代

為了情感聯絡及宣揚理念，1920年，新民會在東京創刊《台灣青年》，1922年更名為《台灣》，同時發刊《台灣民報》，這一年，陳端明發表〈日用文鼓吹論〉主張白話文，撒下新文學的種籽，當然，做為台灣人唯一之喉舌、文化協會的機關報，這三份刊物雖是偏重於政治、社會的議題，卻已為文學創作預留了園圃。

相對應於留日新青年的積極作為，島內以台灣醫專、師範學校出身為主的菁英，推舉蔣渭水為領導，共謀出路，先是成立文化公司，繼而取得林獻堂的首肯，1921年10月17日，在台北靜修女中成立以「謀台灣文化之向上」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，會員1032人，林獻堂為總理，蔣渭水為專務理事（後為蔡培火），文化協會的組成代表著傳統士紳、海外留學生、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的結合。

文化協會成立後，迅速發展它的組織，分立台北、台南、彰化、員林、新竹等五個支部，並且支援每一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。然而，文化運動所形成的磅礴氣勢，使台灣總督府採取了壓制的措施，先是以公益會來反制，並以有力者大會來反擊，進而於1923年12月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全島大逮捕重要幹部，此即治警事件，文化協會受此衝擊反而更加蓬勃發展。

文化協會所施展的啟蒙運動，其設定的目標表面上是提升文化，實則要強化台灣的特殊性，黃呈聰主張建設台灣的特種文化，避免被同化；蔣渭水主張消除民族差等待遇，提高台灣人的品格，完成「台灣人的使命」；蔡培火主張建立自尊的人格，用台灣話語喚起民族覺醒。

與陳端明發表〈日用文鼓吹論〉的同時，謝春木也在《台灣青年》發表日文小說〈她往何處去〉，啟動了新文學的創作，次年即有柳裳君在《台灣》發表的暗諷式小說〈犬羊禍〉，由於傷及林獻堂的人格而引起騷動。《台灣》雜誌時期最重要的是黃呈聰〈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〉與黃朝琴〈漢文改革論〉兩篇語體改革的文章，顯然是受

<sup>1</sup> 參見林柏維〈風起雲湧文化潮：台灣文化協會〉，《我在我不在的地方》，頁350-359，台南市，國立台灣文學館，2010.12。

到陳獨秀、胡適倡導文學革命的影響，正式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革命運動，且是「漢文」的文學改革，雖只是就語言、文字的運用提出改革，卻是台灣新文學運動最具革命性的發軔點；稍後，蔡培火在《台灣民報》發表〈台灣新文學運動和羅馬字〉，將台灣新文學一辭正式推出檯面，也提出了後世對台灣文學使用漢字或羅馬字的爭論問題。

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族意識，進而爭取政治權，造成民族自決的氣勢，以期脫離日本統治，林獻堂說：「要以改造的精神（在）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。」就是這樣的意思。多面向的新文化運動，掀起全島文化啟蒙的熱潮。

在文化運動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已難有著力點之際，外圍團體日趨成熟，先是李應章於 1925 年成立二林蔗農組合，開農民運動的先河，各地農民組合相繼成立，後來在簡吉的串聯下，形成台灣農民組合；左翼路線已成氣勢的情勢下，文化協會終於在「走向實際運動」的呼聲中分裂。

1927 年，左翼的連溫卿、王敏川掌控文化協會，改走階級鬥爭路線，改設本部於台中，同時，外圍團體台灣農民組合本部也移設台中。右翼的蔡培火、蔣渭水也於台中另組台灣史上第一個政黨：台灣民眾黨，進入實質的政治運動，蔣渭水更於 1928 年組織外圍團體台灣工友總聯盟。如此，左右兩派分途展開了農工運動。

轉換方向後的文化協會，以連溫卿為中心，展現與舊文協時代完全不同的風貌，「主張以最大多數的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其目的」。1928 年，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，決議：「利用文化協會作為共產黨活動的舞台」。1929 年，謝雪紅及台灣共產黨掌握了文化協會，這樣的結果，使統治當局在 1930 年採行台共黨員大逮捕的毀滅性動作，等同解散文化協會。

台灣民眾黨以「確立民本政治，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。」在蔣渭水的領導下也逐漸左傾，右派的林獻堂、蔡培火等脫離，在楊肇嘉主導下，於 1930 年在台中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；分裂後的台灣民眾黨，由於急進的政治主張，也在 1931 年被禁止結社。此時，日本已積極對外發動侵略戰爭，壓縮人民集會結社的空間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已難能有所作為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難有成就，在 1935 年取得台灣史上第一次地方選舉的成果後，於 1937 年自動解散，為二〇年

代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劃上休止符。<sup>2</sup>

### 三、診斷台灣：〈臨床講義〉

文化協會在初創之時，便有發行機關報紙《會報》的計劃，在大正十年（1921）11月28日，出版了第一號《會報》一千二百份。揭載了蔣渭水的〈臨床講義〉一文，把「台灣」比喻做患者，且註明其籍貫為「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，現住所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」，強烈地表明無法承認台灣已被隸屬於日本的事實。

〈臨床講義〉：

患者：台灣

一、姓名：台灣島

一、性別：男

一、年齡：移籍現住址已有二十七歲

一、原籍：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

一、現住所：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

一、緯度：東經一二〇——一二二，北緯二二——二五。

一、職業：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守衛。

一、遺傳：明顯地具有黃帝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等血統。

一、素質：為上述聖賢後裔，素質強健，天資聰穎。

一、既往症：幼年時（即鄭成功時代），身體頗為強壯，頭腦明晰，意志堅強，品性高尚，身手矯健。自入清朝，因受政策毒害，身體逐漸衰弱，意志薄弱，品性卑劣，節操低下。轉居日本帝國後，接受不完全的治療，稍見恢復，唯因慢性中毒長達二百年之久，不易霍然而癒。

一、現症：道德頹廢，人心澆漓，物欲旺盛，精神生活貧瘠，風俗醜陋，迷信深固，頑迷不悟，罔顧衛生，智慮淺薄，不知永久大計，只圖眼前小利，墮落怠惰，腐敗，卑屈，怠慢，虛榮，寡廉鮮恥，四肢倦怠，情氣滿滿，意氣消

<sup>2</sup> 文化協會之歷史發展，參見林柏維《台灣文化協會滄桑》，台北：台原，1993.6。



沈，了無生氣。

主訴：頭痛，眩暈，腹內飢餓感。

最初診察患者時，以其頭較身大，理應富於思考力，但以二、三常識問題試加詢問，其回答卻不得要領，可想像患者是個低能兒。頭骨雖大，內容空虛，腦髓並不充實；問及稍微深入的哲學、數學、科學及世界大勢，便目暈頭痛。

此外，手足碩長發達，這是過度勞動所致。其次診視腹部，發現腹部纖細凹陷，一如已產婦人，腹壁發皺，留有白線。這大概是大正五年歐大戰以來，因一時僥倖腹部頓形肥大，但自去夏吹起講和之風，腸部即染感冒，又在嚴重的下痢摧殘下，使原本極為擴張的腹壁急劇縮小所引起的。

一、診斷：世界文化的低能兒。

一、原因：智識的營養不良。

一、經過：慢性疾病，時日頗長。

一、預斷：因素質純良，若能施以適當療法，尚可迅速治療。反之，若療法錯誤，遷延時日，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。

一、療法：原因療法，即根本治療法。

處方：

正規學校教育	最大量
補習教育	最大量
幼稚園	最大量
圖書館	最大量
讀報社	最大量

若能調和上述各劑，迅速服用，可於二十年內根治。

尚有其他特效藥品，此處從略。

大正十年十一月三十日

主治醫師蔣渭水<sup>3</sup>

<sup>3</sup> 白成枝編《蔣渭水遺集》，台北，蔣先烈遺集刊行委員會，頁 94-95。

原本身體壯碩，頭腦明晰，意志堅強的台灣，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，卻變成「世界文化的低能兒」，民族、歷史、文化的淪喪，實令人心寒，蔣渭水以「民族運動之醫師」的立場，開立五味藥方，這五劑正是促使民族覺醒的良藥，如不及時服用，則「台灣」的命運將無法挽救。

蔣渭水對台灣的努力是全方位的，醫國也醫民的他，以大安醫院為民報的發行所，在診療台上開立〈臨床講義〉、診斷台灣，立下醫學文學的典範。

#### 四、蔣渭水式的抗議文學

1933年成立「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」，引發「治警事件」，當局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，全島大檢舉，拘捕四十九人，蔣渭水等十三人被判有罪。正當文化協會主力幹部因治警事件被起訴之際，張我軍延續黃呈聰與黃朝琴普及白話文的議題，認為如要建設台灣的新文學，勢非得打倒舊文學不可，所謂舊文學係指那些吟風詠月、無病呻吟的舊式詩文而言，先以〈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〉提出了批評和指責，又以一篇〈糟糕的台灣文學界〉正式向舊文學展開攻擊，對當時充滿烏煙瘴氣的台灣文壇，投下一顆炸彈，為台灣文學史上的第一次新舊文學論戰拉開序幕。

在文化啟蒙的運動熱潮中，連雅堂等舊詩人也起而還擊，張我軍再發表〈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〉、〈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廟堂〉、〈絕無僅有的擊畢吟的意義〉，把舊詩人攻擊得體無完膚，悶葫蘆生、鄭軍我等則以《台灣日日新報》、《台灣新聞》、《台南新報》等為堡壘回擊。然而，新文學陣營除了攻擊舊文學外，也開始了新文學的創作，皆有突出的表現，如：施文杞的〈台娘悲史〉、賴和的〈鬥鬧熱〉、楊雲萍的〈光臨〉、張我軍的〈買彩票〉等小說，張我軍的《亂都之戀》更是台灣第一本現代詩集，也由於新文學作品的逐漸出現，台灣新文學運動也由理論進入具體化的階段。

治警事件後，蔣渭水經常身陷牢獄，他在《台灣民報》發表多篇牢獄文學的篇章，引起許多共鳴和回應。簡單來分，獄中作品可分類為仿古書懷與日記隨筆兩種型態。



## 仿古書懷

仿古書懷以辭賦序文為體，被仿寫之大家及作品為：陶淵明〈歸去來辭〉、韓愈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、曹操〈短歌行〉、蘇軾〈赤壁賦〉、李白〈春夜宴桃李園序〉、劉禹錫〈陋室銘〉，仿寫之佳構不出於古文觀止；仿古之作原即富含詼諧之意，並寄寓原作旨意，以為借題發揮，雖為仿作，卻也深具創意。

他的仿古首篇〈快入來辭〉一起頭便是：「快入來兮，心園將蕪胡不入，己自以身為奴役，奚惆悵而獨悲。悟已往之不入，知來者猶如仙。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今是而昨非（入即是，不入即非）。」<sup>4</sup>模仿鑿痕清晰可見，兩小段中，後二句皆照抄原文，「借古諷今」之意濃烈。文轉敘述獄中生活，自非田園樂趣，實是苦中作樂：「禪坐在室，有書盈房（房小書多）。開卷讀以自修，低吟詩以怡懷（獄裡禁聲不許高吟）。倚鐵窗以倨傲，稔牢舍之易安。住日久以成趣（慣勢成自然），門雖設而常關（且加錙）。時散步以休憩（讀書作文時出庭園散步），則遠首而遊視。雲無心以出岫，我有志而難成。景翳翳以將暮，撫短鬚而盤桓。」我有志而難成一語道盡了內心的苦鬱。結尾以「策士同以歸正（世界大同同歸正義），共扶人道復奚疑。」寄語理想所在。

在〈送王君入監獄序〉一文中，蔣渭水仿韓愈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，借其文章脈絡，為王敏川之入獄壯行，先是讚美王敏川慷慨入獄的不同流合污，大丈夫為民請願的義膽豪情，繼之以：「蘭陽渭水聞其言而壯之，與之酒，而為之歌曰：『獄之中，惟子之宮。獄之床，可坐禪。獄之窗，可讀可詠。獄之嚴，誰敢去擾。……離吾妻分別吾母，從子於獄兮，終吾生以學禪。』」<sup>5</sup>相互共勉。

〈入獄賦〉是蔣渭水仿蘇軾〈赤壁賦〉的作品，先是敘述入獄後的牢房居所，一番感喟後，藉蚊聲（替代赤壁賦中的「客有吹洞簫者」）嘲諷田健治郎總督：「方其任總督，渡台灣，順風而南也，迎者千人，何等威風，以酒宴客，集雅賦詩，固一時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」<sup>6</sup>並以此勸戒繼任的內田嘉吉總督<sup>7</sup>，須知：「藉一朝之權勢，舉暴威相戕，行惡虐於此地，負蒼生之希望，知威風之須臾，羨島民之無窮。挾飛艇以

<sup>4</sup> 〈快入來辭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3，頁8，1924.2.21。

<sup>5</sup> 〈送王君入監獄序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5，頁16，1924.3.21。

<sup>6</sup> 〈入獄賦、春日集監獄署序、牢舍銘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3號4，頁18，1925.2.1。

<sup>7</sup> 第八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（1919.10.29.-1923.9.6.），第九任台灣總督內田嘉吉（1923.9.6.-1924.9.1.）。參黃昭堂《台灣總督府》，自由時代出版社，頁114。

相擊，執干戈而相攻。」當然，這樣的期待也是「知不可乎以行得」，只得「託悲憤於悲風」。

在仿劉禹錫〈陋室銘〉的〈牢舍銘〉一文中，自然是將牢舍比陋室，用以自我消遣，文字卻在最後翻轉：「宋朝三字獄，周代公冶刑，多人云：『何罪之有？』」批判當局的大逮捕是挾違反治安警察法的藉口，行文字獄的虐政。相類似地，他仿李白的〈春夜宴桃李園序〉寫〈春日集監獄署序〉，感慨台灣前途：「會臺北之監獄，論臺灣之政事。感慨悲歌，皆為燕趙，吾人動作，獨慚印鮮。」意有所指：同是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，印度、朝鮮的獨立運動聲勢高昂，台灣怎可落人之後？

### 日記隨筆

日記、隨筆乃是我言寫我觀，記錄型式地文章或可類比到報導文學，也有著歷史文獻的存留意義，隨筆則多了一些雜感與評論，皆能忠實地反映出作者心境與對客體的細緻描述。蔣渭水的日記與隨筆都是用白話文寫的，發表於《台灣民報》，前期有三篇：〈入獄日記〉<sup>8</sup>、〈入獄感想〉<sup>9</sup>、〈獄中隨筆〉<sup>10</sup>，前兩篇寫獄中（1923.12.-1924.2.），第二次入獄時，由於紙筆被獄吏沒收，無法寫作，因此後一篇是寫於出獄後（1925.5.）<sup>11</sup>。後期也有三篇：〈北署遊記〉<sup>12</sup>、〈三遊北署〉<sup>13</sup>、〈女監房的一夜〉<sup>14</sup>；前期的文章主要在述說入獄的生活情形與感懷，兼述對親友的思念心情，後期的文章不再侷限於自身得牢獄生活，轉向到對獄政的觀察與批評。

〈入獄日記〉常描述與同志的相互關懷、對家人的思念：

例如：12月27日，提及收到林獻堂的慰問品有衛生衣、塵紙、汗巾、襪子等：「

見其物如見人，觸物的時生出一種懷慕的、感想。」<sup>15</sup>

例如：1月4日，「幼春兄食慾不進多痰善嗽，所以時常拜聽他的馨咳，不是這樣

<sup>8</sup> 〈入獄日記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6,7,8,9,10,11,13,1924.4.11.1924.4.11-7.21。

<sup>9</sup> 〈入獄感想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7,8，1924.4.21.-5.11。

<sup>10</sup> 〈獄中隨筆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59,60,61,62，1925.7.5.-7.26。

<sup>11</sup> 〈獄中隨筆（一）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號59，頁10，1925.7.1。

<sup>12</sup> 〈北署遊記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號186.187.188，1927.12.11。

<sup>13</sup> 〈三遊北署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號235.236.237，1928.11.18。

<sup>14</sup> 〈女監房的一夜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號249，1929.2.24。

<sup>15</sup> 〈入獄日記（二）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7，頁12，1924.4.21。





，就沒有聽到他的聲息了；他的嗽，是我的好伴侶。」<sup>16</sup>

例如：1月8日，接到林呈祿從東京寄來的慰問品，蔣氏云：「表面書千祈保重四字，看伊的字，像看伊的面一般的，感想，又藉知東京的同志，沒有受災殃，又可知呈祿兄，歸京活動的消息，可算是一報兩喜了。」<sup>17</sup>

例如：12月26日：接到愛妻阿甜的信，將信件內容抄錄在日記裡，並書感懷：「算是愛情濃厚的寫法，我很歡喜，愛妻的面目躍躍可見，語言三復，我則不知連讀幾十遍了。」<sup>18</sup>

〈獄中隨筆〉則是對獄中所見所聞的敘述與感想：

例如：獄內的飯分六級……我是不做工的囚人，所以只配吃六等飯……雖是下等的糙米，總是若比南部農人同胞專喫蕃薯簽還是好些。老實說飯量是不足，所以我連秕粟都吞落去。又因為沒有肉類，石灰質一定是不足，故此連飯中的小石，也哺破吞下，到此時石頭也是營養品了。<sup>19</sup>

例如：「監獄，息交絕遊，與世相違，請問似仙，靜寂如佛，近在咫尺，遠似千里，衣服物資得亨（享）市井利便，內宮奧室，宛如幽谷深山，是修行冥想學禪的靈地。」<sup>20</sup>

例如：「下車的時候，因為我的書包太多，托同車的囚人們幫忙，內中有一個囚人說：『蔣先生是替台灣人做事的人，正經正經，我們應該替他幫忙。』眾囚人聽著便七腳八手，將我的行李，都替我搬得乾淨，這是這回入獄第一次的收穫了。」<sup>21</sup>

蔣渭水在獄中書寫的〈快入來辭〉、〈入獄日記〉等多篇牢獄文學作品，豎立了蔣渭水式的抗議文學，學者林瑞明認為：「蔣渭水不是文學家，但因為有這些獄中作品，他也可以在台灣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。」<sup>22</sup>當然，在蔣渭水所撰寫的文章裡，牢獄文學作品只是一部份，他大部份的文章屬於評論時政、政治主張性質，例如：〈可惡至極的

<sup>16</sup> 〈入獄日記（三）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8，頁12，1924.5.11。

<sup>17</sup> 〈入獄日記（四）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9，頁11，1924.6.1。

<sup>18</sup> 〈入獄日記（二）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7，頁12，1924.4.21。

<sup>19</sup> 〈獄中隨筆（二）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號60，頁9，1925.7.12。

<sup>20</sup> 〈入獄感想（二）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卷2號8，頁10，1924.5.11。

<sup>21</sup> 〈獄中隨筆（一）〉，《台灣民報》，號59，頁11，1925.7.1。

<sup>22</sup> 參林瑞明〈感慨悲歌皆為鯤島：蔣渭水與台灣文學〉，《民眾日報》副刊，1991.10.12。

北署之態度〉、〈晨鐘暮鼓〉、〈迎台灣的新新年〉，至於〈五個年中的我〉則是他對投入社會的、政治的改革運動的心路歷程。

## 五、醫國也醫民：蔣渭水的文學風采

受到文化協會社會運動的影響，台灣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十足地表現出寫實的風采，他們關懷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，使文學負載著人道主義的使命，加上文化協會追求台灣主體特殊性的理念，也使文學多了政治軌道的兩難選擇。嚴格來說，蔣渭水是政治家，不是文學家，他在台灣民報發表了相當多篇文章，大都屬於針貶時政的政論文章，提出政治與社會改革的論點，呼籲人民快快覺醒。與文學具有關聯的篇章則幾乎都是牢獄之中寫就的篇章，由於從事政治運動、社會改革，使他的作品深富政治色彩，被殖民、被壓迫的反抗精神自然貫穿了他的作品，成就了牢獄文學的風格。

無疑地，在張我軍以〈糟糕的台灣文學界〉揭開台灣文學史第一次新舊文學的論戰中，蔣渭水與賴和、施文杞、張我軍、楊雲萍、前非、張梗等人以創作積蓄了新文學的發展實力。他執筆針貶時政，他無畏於 1923 年治警事件的政治迫害，在獄中書寫〈快入來辭〉、〈入獄日記〉、〈入獄感想〉、〈獄中隨筆〉、〈北署遊記〉等多篇牢獄文學作品，豎立了蔣渭水式的抗議文學。

蔣渭水，興文化啟蒙的風雲，做政黨政治的先鋒，建農工運動的生機，為台灣新文學推波助瀾，其文學風采不在典範、在先行。

